

从天下到国家：中国现代转型的思想史解释

——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于浩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上海

【摘要】《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是约瑟夫·列文森的代表作，在海内外中国研究领域有着重要意义。文章旨在评析列文森在该书中对中国现代转型的思想史解释，揭示其关于中国从“天下”向“国家”转变核心命题。文章按照原书的三卷结构，结合思想史与制度史视角，对“中体西用”的思想困境、儒家与君主制之间的张力以及儒家“博物馆化”等关键论点进行了重点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列文森指出了“中体西用”思潮难以调和传统与现代的深层冲突，儒家也随着君主制的逐步灭亡而衰落下去，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儒家更是由一种现实制度资源转化为历史记忆与文化象征。研究结论：列文森的解释为理解中国现代国家转型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思想史框架，尽管其部分论断带有时代局限，如过度强调冲突、简化倾向、无法解释儒家的复归，但其对儒家传统普遍性丧失过程的分析至今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列文森；现代民族国家；儒家思想；现代化转型

【收稿日期】2026年3月4日

【出刊日期】2026年4月16日

【DOI】10.12208/j.ssr.20260120

From *Tianxia* to the Nation-State: Interpreting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rough intellectual history — A review of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Hao Yu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is Joseph R. Levenson's representative work and has exerte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hinese studie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Levenson's intellectual-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this work,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is central thesis concerning China's transition from *Tianxia* to the modern state. Following the three-volume structure of the original work and drawing on perspectives from both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the article provides a focused analysis of several key arguments, including the ideological dilemma of "Chinese learning as substance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application," the tens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onarchy, and the "museumization" of Confucianism. The article finds that Levenson revealed the difficulty of reconciling the deep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ithin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learning as substance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application." He further argued that Confucianism declined alongside the gradual collapse of monarchy, and tha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fucianism was transformed from a living institutional resource into historical memory and a cultural symbol.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Levenson's interpretation offers an illuminating intellectual-histor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modern state transformation. Although some of his arguments were shaped by the limitations of his time, such as an overemphasis on conflict, a tendency toward simplification, and an inability to explain the later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his analysis of the loss of universal validity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remains highly suggestive today.

【Keywords】 Levenson; Modern nation-state; Confucianism; Modern transformation

1 问题意识：列文森对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思想史追问

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是20世纪中叶美国中国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者之一，被誉为“莫扎特式的史学家”^[1]。美国亚洲研究协会至今仍设有以他命名的“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以奖励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英文专著。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试图解答以下关键问题：如何理解儒家思想在近代以来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共产主义为何最终在中国取得胜利？其中最著名的阐释便是来自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说”（impact-response）^[2]。列文森是费正清最杰出的学生之一，常被认为是费正清学派的一员，因而有学者批评列文森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带有明显的19世纪印记，并且这种理解体现了一整代美国历史学家思想的狭隘^[3]。事实上，尽管二人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列文森在具体理论上并不是费正清的继承者。相反，他的研究极具独特性，展现出其作为海外学者对儒家中国无比的包容心^[4]。后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通常把费正清归入更典型的“冲击-回应”路径，而把列文森归入“现代化/传统-现代”（modernization / tradition-modernity）路径：前者强调中西接触与制度变迁，后者则更关注传统价值秩序在现代中国中的危机、断裂与重组^[5]。

《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是列文森的代表作，该书以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型为背景，采取“复调”叙事的方式，诠释了近代中国各阶段思潮背后的文化心理^[1]，对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的衰落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系统阐释，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还可看作是一部对话史学作品，它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编织出了一张对话关系网^[4]。通过这样独特的论述方式，列文森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宏观的历史命题，即中国近代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从“天下”秩序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

“天下”一词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前者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后者则是今日意义的“中国”。今天语境中的“国家”是指“民族国家”，翻译自起源于欧洲的“nation-state”。民族国家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便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6]。在这一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传统中国文明所依托的价值体系逐渐

失去其普遍性，而现代国家则成为新的政治与文化组织形式。这一解释框架不仅为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变迁提供了重要视角，也为后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列文森去世后，其书中许多的研究内容已经被深入挖掘乃至超越。有学者指出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对世界认知的关键节点。在此之后，中国学者不仅接受了外部世界的存在，而且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置身于世界之外，最后，他们只能放弃以往以天下为基础的秩序，转而寻求既定外部秩序的认可和接纳^[7]。还有学者拓展了列文森的命题，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史除了有一个“天下”到“国家”的转变，还有一层从“天下”到“世界”的进程^[8]。这表明，列文森提出的历史命题虽然影响深远，但围绕其解释框架的讨论并未终结，而是不断在新的学术语境中被补充、修正与推进。

本文认为，列文森关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思想史解释至今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具有内在连贯性，但其解释框架也仍然存在一定限度，主要表现为对传统与现代之间断裂性的强调较强，带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知识背景，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儒家资源在现代中国的再功能化与象征性回归。基于这一判断，本文将围绕“列文森关于中国现代转型的解释何以仍有解释力，其不足又何在”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并借助书评这一形式，对其核心命题进行系统梳理与再评议，以期在评析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中国现代转型。

2 传统与现代之间：“中体西用”的思想困境

根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一卷的内容，在探究儒家思想的历史命运时，列文森首先关注的是近代中国在西方冲击之下所面临的思想选择问题。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与经济力量进入东亚，中国传统社会所依赖的政治与文化秩序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儒家思想作为传统中国主导性价值便不得不对这种衰落负责，但是近代思想家们同儒家思想决裂却是一个长期过程^[8]。列文森认为，在19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人心中被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他们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他们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10]。并且，列文森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相互融合的前景并不抱持乐观态度^[11]。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正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一种新的思想定位。“中体西用”是第一种为引进西方文化的合理化表述。在列文森看来，“体/用”

二分法符合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这是一种掩饰了外来价值渗透的心理伪装。列文森将“中体西用”视为一种试图调和传统与现代、却又难以真正自洽的过渡性方案，他对“体/用”关系的辨析，以及对西方科学技术背后整套文明逻辑的强调，触及了近代中国思想困境的深层结构：在张之洞等人那里，代表中国道德和美学的“体”远比作为手段的西方自然科学的“用”更有价值，但是，“中体西用”中合理化“体”的操作本身就是谬误。列文森的论据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西方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入侵者，对于后者，中国可以通过“抚夷”或“剿夷”的方法保持自身的自主地位。而西方主要是通过工业、商业手段来远程操控中国，他们的权力基础始终处于中国疆域之外，不需要在任何程度上让自己成为中国人。因此，留给清政府的唯一抵抗手段就是增强军事实力，而这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是孤立而纯粹的知识，它是一个体系，其每一次增长都会相应地影响到整个知识体系，从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西用”的引入最终侵蚀了儒家文人的思维方式，削弱了他们对儒学的不可替代性的坚定，随之而来的工商业也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儒学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

第二，“中体西用”本身在哲学层次就存在缺陷。洋务派的“体/用”是宋代儒学理论的庸俗化。在朱熹那里，“体”与“用”是识别同一事物的两种模式，“体”即事物的本质、实质，它必然意味着事物的功用、行动，“体用不二”，二者是某种自然的内在共生，“体/用”是相互依存、相互表达的，如果少了一个，另一个也无法理解。张之洞则是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一些东西归于“体”，在西方文化中找到一些东西归于“用”，拼凑起来，因此二者在客观上是分离的，只能在抽象理论中合二为一。朱熹的“体/用”是形而上学的，而张之洞的“体/用”关注的是社会学范畴里文化本质的问题。

第三，“西用”的背后是工业主义的蓬勃发展，而这需要一定社会环境才能实现。19世纪中国的官僚制结构及其反科学、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氛围，还没有像西方的封建制度那样被削弱。洋务派借鉴“西用”恰好说明中国社会内部还未准备好接受工业化，这也是洋务派在器物层面“自强”失败的原因。

因此，“中体西用”是个双重意义上的谬误。一方面，来自西方科学技术的“用”无法像洋务派官员宣称的那样保护中国的“体”，它的引入不仅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社会混乱，也加速了本土社会秩序的解体。另一方

面，苟延残喘的旧制度的“体”也抑制了中国去接受据称能帮助自身走出困境的“用”。

进入20世纪，民族主义开始占据人们的视线，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把矛头对准满人统治，舍弃了中国的文化主义——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尊崇、中国文化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转而将自己的忠诚投向了新的民族国家概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天下”被打破了，中国不再意味着人们眼中的整个世界，而只不过是现代世界中的一份子。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虽然中国走下了作为“天下”的神坛，却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身的方向，为了生存，这一选择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必要的。

列文森对“中体西用”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所面临的思想张力，也说明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变迁的核心，并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引进问题，而是价值体系与文化认同的整体重组问题。但列文森的这分析在揭示思想断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从而容易将“中体西用”理解为一种注定失败的历史尝试。实际上，“中体西用”固然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方案，但它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思想谬误，而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士人在维护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寻求自我调整的一种现实回应。也就是说，它既体现出传统中国回应现代挑战时的内在局限，也反映出近代中国思想界并非被动地告别传统，而是在文化自守与现实变革之间进行艰难探索。

3 文化与制度的张力：儒家与君主制的关系

如果说近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中体西用”问题主要反映了传统文化在面对西方文明时所经历的思想困境，那么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第二卷中，列文森进一步从制度史的角度分析了儒家思想与传统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即儒家官僚集团与君主权力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张力，正是传统中国政治秩序得以维系的重要机制。

在这一部分，列文森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儒家与君主的关系中存在一种对抗性的紧张关系，官僚知识阶层珍视在帝制中央集权下的社会稳定，又不断因为贪得无厌的倾向而趋于离心，以至于危及王朝。列文森将这一儒家与君主关系的悖论视作中国历史的核心，而近代中国的衰落部分是由于失去了这种对抗关系。也就是说，当儒家与君主之间的张力逐渐终止，儒家就处于衰落的过程中，官僚的地位也会随之一路下滑。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中，儒家彻底失去了社会效能，他们不

仅不再能指导官僚的行动，反而需要被官僚捍卫。废除科举制后，儒家更是沦为了纯粹的学问。

儒家与君主制虽然在传统中国政治秩序中长期共存，但二者之间的内在冲突始终是多重的。根据列文森的总结，儒家与君主关系的张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君主制抵制着官僚不断积极推进的对公权力的侵蚀，这种侵蚀使官僚具有走向封建的倾向；二是君主并不总像儒生那样爱好和平，而是像封建制中的贵族那样尚武，君主总是试图掌控令儒生警惕的军事机构；三是儒家理想中的皇位更替是让位于贤者而非基于血缘关系的政治继承，与君主制格格不入；四是君主又倾向于制造出被儒生诟病的类似封建制的体系，它大多数时候由皇室成员构成，用以防范官僚潜在的背叛可能性；五是儒生的家族优先性，即“孝”，与政治上忠于君主的“忠”的冲突可能遭致君主的强烈反感，同时儒生又喜欢把“忠”道德化，要求君主能够辨别忠奸，将他们所定义的“忠”强加于君主。

列文森认为，儒家官僚制的天才之处在于平衡了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同时获得了二者的青睐，却又不真正与二者为伍。以贵族为代表的地方权力可以阻止君主制的崛起或加速其覆灭，君主若要有有效实现中央集权，就必须削弱地方贵族的力量。因此，有效的君主制通常选择用官僚的力量去侵蚀贵族的权益。君主把他们从中央集权中获取的政治资源和利益分配给官僚，通过扶持官僚集团来对抗贵族势力。相应地，贵族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拉拢，成为君主用来牵制官僚集团的工具。然而，儒家官僚实际上并没有与之相当的竞争对手。儒家官僚享有着广泛的社会威望，并且掌握着实实在在的行政权力，他们在这种处境中渐渐培育出了贵族式的骄傲和特有的品质。由此，儒家逐渐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取得了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儒者能够积极进入官僚体系，通过仕途参与国家治理；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够维持道德自主与人格独立，在政治失意或价值冲突时以退隐、批评或疏离的方式保持精神上的超越性。就这样，在儒家与君主制的张力中，儒者似乎呈现出两幅面孔——既在朝又在野，既热衷仕途又归隐山林。与此相对应，君主对儒家官僚也始终保持着矛盾态度，他需要官僚来实现中央集权，但又不得不为了保护中央集权而限制官僚的贪欲，因此即便君主对儒家所代表的价值规范和文化偏好并无兴趣，也仍然需要在政治表达上粉饰自身、迎合儒家，以获取统治合法性并维持政治秩序。

抛开君主，儒家自身也同样不稳定：首先是“内与

外”的张力，它代表着修身与平天下、知与行、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矛盾。其次是“私与公”的张力，儒家谴责追求利益而非道德的行为，这恰恰说明有人可以利用道德的名义来掩盖追求私利的事实。然后是家族与宗族的张力，不论是君主选择用宗族限制家族的政策，还是用家族限制宗族的政策，儒家的情感都能够被调动起来：家庭可能会造成社会横向上的分裂，宗族也可能演变为高度自治的私人权力或准贵族，甚至成为反动的秘密会社。再次是品格与学问的张力，它指儒家官僚对科举制持有既支持又怀疑的态度，儒家官僚一边希望通过科举考试限制武官、宦官的权力，一边希望科举制为品格留有余地，不要完全采用不带感情的标准化考试。最后是先例与规则、自由与监督的张力。儒家需要先例与规则来约束君主以及指导自身的活动，但受尊崇的先例也可能颠覆儒家；作为官僚，儒者既需要一定的自由，也需要受到君主的监督。

列文森在这一部分对儒家与君主制关系的分析中，突破了将儒家简单理解为维护皇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看法，进一步揭示出儒家官僚集团与君主权力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张力。这一分析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因为它不仅将儒家置于思想文化层面加以考察，也将其放回具体的制度运行过程之中，从而说明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维系并非单纯依赖某种静态的价值共识。从这一点看，列文森对儒家与君主悖论性关系的揭示深化了对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理解。但与此同时，列文森的相关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从对抗的角度来把握儒家与君主制的关系，从而较多强调了二者的内在冲突，相对弱化了它们在长期历史运行中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塑造。

4 儒家传统的历史命运

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三卷中，列文森试图厘清儒家思想与20世纪60年代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关系。20世纪50、60年代有关共产主义中国的研究中，较为盛行的一种解释路径是将其理解为传统中国尤其是儒家政治文化的延续或变形。列文森将这种倾向所依据的预设概括为一种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过度强调，即研究者往往先验地认为中国始终保持着某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连续性”，从而倾向于把共产主义中国看作旧中国的自然延伸，而非一种新的历史形态^[12]。也就是说，这一流派认为儒家和共产主义具有相似之处，并且存在一种“中国本质”（费正清称之为“专制传统”），而共产主义中国就是延续了这种本质。例如，沟口雄三认为“正是在中国强有力伸展着的相互扶助

的社会网络、生活伦理以及政治理念，才是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就是说，社会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来讲，它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而是土生土长之物。^[13]

列文森明确地批评和反对现代中国继承了儒家遗产的观点。反之，列文森认为，儒家思想已经在共产主义中国被“博物馆化”了。顾名思义，“博物馆化”是指，在新中国，儒家就如同历史文物一般被放进博物馆中供人观赏。因此，“博物馆化”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某些东西已经失去了，并乐于保持着这些已逝之物的记忆。^[14]”例如，一方面，孔子在作为推动历史的社会力量时是进步的，因为他代表了封建主义对奴隶社会的抵制；另一方面，他也可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代表了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阻碍。罗志田推测列文森的博物馆比喻很可能受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吴稚晖、钱玄同等人“把中国传统送进博物院”表述的影响^[15]。

在列文森看来，儒家“博物馆化”的特点在于它只具有历史相关性，而与今天的现实无关。这种态度本身已经处于一种新的、现代的、总体上反儒家的历史视野之中，因而不能简单视为传统儒家的延续。列文森的证据主要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史学，现代中国对儒家的理解已经不再是儒家对自身的理解，而是被放进另一套解释框架中加以评价：新中国的历史学家努力将中国历史嵌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各个阶段。他们通过历史分期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等同起来，并强调中国社会转型主要来自中国的内部矛盾。当然，有学者对“博物馆化”的理解截然相反，认为列文森的观点只是在表面上说现代中国与儒家的断裂，实际仍在阐释共产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延续，是中国本土思想的产物^[16]。

在传统中国的政治观念中，“天下”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秩序概念。中国并不仅仅被理解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而被视为文明世界的中心。在这种观念结构中，儒家思想既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也是社会秩序的重要价值基础。然而，随着近代以来世界体系的变化，中国逐渐被纳入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之中。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其作为社会普遍价值体系的地位，并被纳入历史叙事之中。由此，列文森认为，困扰近代中国知识精英或民族主义的问题不是民族灭亡的危险，而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在世界上遭遇到边缘化的命运^[17]。虽然列文森并未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中国与中国传统之间关系的问题，但他的判断却十分精准：中国传统文明在现代并未被更新，而是被拆解了，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是其中最

伟大的拆解者。共产主义既被看作中国知识阶层脱离中国传统的顶点，也被看作这一漫长而痛苦过程的终结。通过与过去决裂，即通过把儒家“博物馆化”，共产主义中国已经成为了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18]。

需要指出的是，列文森以“博物馆化”概括儒家在现代中国的命运，确实揭示了儒家由现实制度资源向历史文化对象转化的重要趋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今日距离列文森写作的时代已经近60年，若将这一判断视为对儒家现代处境的完整概括显然是不足的。也正因如此，列文森的判断更应被理解为对儒家原有制度形态衰落的一种深刻诊断，而非对其现代命运的终局性概括。

5 列文森解释框架的局限性

应当说，列文森对中国现代转型的解释之所以具有持续影响力，正在于他敏锐把握了近代中国在价值、制度与文化认同层面所经历的深刻危机，并以“天下”向“国家”的转变、“中体西用”的思想困境以及儒家“博物馆化”等命题，勾勒出一条极具穿透力的思想史线索。然而，也正因为其解释框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它在提供高度概括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简化倾向。若从今天的研究视野回看，列文森的分析虽然富有洞察力，但并不能无保留地被视为理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终结论。

列文森较多强调传统与现代、天下与国家之间的断裂性，容易形成一种较强的二元叙事结构。这种写法固然有助于凸显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剧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概念在现代语境中的调适、转化与延续，因而容易将中国现代转型理解为一种单向的替代过程。实际上，无论是“中体西用”所体现的折中尝试，还是晚清以来对“天下”“国家”“世界”关系的重新理解，都说明中国近代思想变迁并非简单地由传统走向现代，而是在多重张力中不断调整和重构的。

列文森对儒家现代命运的判断虽然尖锐，却可能低估了儒家资源在现代中国的再生性。他关于儒家“博物馆化”的论断，准确揭示了儒家作为传统制度资源和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趋势，也点明了儒家从现实规范体系向历史文化遗产转化的重要事实。但若将这一判断直接等同于儒家在现代中国的全部命运，则显然仍不充分。事实上，现代中国的儒家并未仅仅停留于被展示、被纪念的文化遗产层面，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再功能化与象征性复归的复杂面向。在教育领域，儒家经典、传统礼仪与人格养成话语不断被重新引入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之中,儒家由此重新获得育人资源的意义。在伦理层面,儒家思想也被赋予回应价值失范、重建社会规范和强化道德整合的现实功能。同时,在国家文化叙事层面,儒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持续被纳入国家认同建构与文明叙事之中。由此可见,儒家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并非单纯走向“博物馆化”,而是在制度性衰落与功能性复归并存的过程中,经历了新的历史重构。

6 结语

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各卷中,列文森从不同视角展现了传统儒家价值普遍性丧失的过程^[18]。不论是恢复“体/用”范式论述中西文化的观点,还是民族主义叙事,均以现代的普遍性为标准,而中国则成了“特殊”的那一个。列文森时刻提示着我们:如果我们对于传统的维护,在于不断地强调它的“国性”,这其实就意味着将传统置于“特殊”当中,而我们背后则可能有了新的“普遍性”^[19]。尽管列文森在写作本书时所看到的中国已经与今天的中国相去甚远,但人们对近现代中国的理解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列文森曾经关注的问题,或者回到列文森,即使有时这种思想上的对话不是直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列文森的研究并不仅仅属于特定的学术时代,而仍然为今天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提供着富有启发性的思想资源。今天重新讨论列文森,并不是要简单否定其解释框架,而是在承认其学术贡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度修正:既要看到他对中国现代转型中断裂性、危机性与价值重组的深刻揭示,也要明晰其关于断裂、危机与转型的论述仍需在更丰富的历史脉络中加以修正和深化。

参考文献

- [1] 莫里斯·迈斯纳,罗茨·墨菲编:列文森:莫扎特式的史学家[M]. 曾小顺,张平,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
- [2] 程志华. 哈佛学派儒学观的莫立、嬗变与成熟[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49-56.
- [3] COHEN P A.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M]. Routledge, 2003: 51.
- [4] DONG M Y, ZHANG P. Joseph Levenson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a dialogic history[J].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2014, 8(1): 1-24.
- [5] COHEN P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9-96.

- [6] 周平. 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J]. 政治学研究, 2009(4): 89-99.
- [7] LUO Z. From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o “the world”: changes in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onceptions of human society[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8, 29(2): 93-105.
- [8] 卢华. 从“天下”到“世界”:重审列文森命题[J]. 读书, 2024(11): 20-28.
- [9] 赵刘洋. 断裂、延续与转化:海外学界儒家中国近代命运的三种书写路径[J]. 学术界, 2024(9): 198-209.
- [10] 约瑟夫·勒文森.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M]. 刘伟, 刘丽, 姜铁军,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4.
- [11] 察应坤. 论文化主体性建设——基于梁启超中国思想史“主系、旁系、闰系”的分析[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5(2): 56-67.
- [12] LEVENSON J R. The place of Confucius in Communist China[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2(12): 1-18.
- [13] COOMARASWAMY A K. Why exhibit works of art?: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traditional or “normal” view of art[M]. London: Luzac & Co., 1943: 7-8, 69, 99.
- [14] 罗志田. 送进博物院:清季民初趋新士人从“现代”里驱除“古代”的倾向[M]//罗志田. 裂变中的传承:20 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修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101-144.
- [15] 王锐. 中国传统思想与 20 世纪革命之关系——对晚近三种诠释路径的反思[J]. 探索与争鸣, 2024(10): 86-99, 178.
- [16] 黄克武, 王瑞, 赵洲洁. 近代儒学的两次转向——《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再思考[J]. 国际儒学(中英文), 2025, 5(3): 1-17, 190.
- [17] MEISNER M. A review article: Sinological determinism[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7(30): 175-183.
- [18] 约瑟夫·列文森. 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 刘文楠, 译.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3:89-110、129-196、243-328、439-528.
- [19] 赵金刚. 列文森的“剃刀”——传统文化与普遍性[J]. 开放时代, 2023(5): 109-120, 8.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